

首破5万亿元,中国外贸迎来新课题

备受关注的中国外贸,再次迎来高光时刻。据海关统计,9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5万亿元,前三季度整体进出口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创近5年同期最快增速。对于这份成绩单,有声音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偶然冲高,但真正熟悉中国外贸发展历程的人都明白,这份偶然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外贸深耕市场多年、结构持续调整的必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总有观点将中国外贸增长简单归结于低成本优势下的规模扩张,市场冷暖也主要依赖外部需求。但此次单月5万亿元的突破,恰恰出现了两个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一是进口增速22.3%,较出口高出了5.9个百分点。这表明,进口已不再是跟随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被动变量,而是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二是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高达64.3%,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持续放量,外贸增长的核心支撑,已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含量足、附加值高的制造品类。这意味着,中国外贸已告别“以量取胜”的旧路径,一条“量质齐升”的全新增长曲线正在加快形成。

更深层的信号,还藏在悄然改变的多元

中国外贸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与全球伙伴的共建共享——既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优质产品,也向世界开放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在扩大开放中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化布局中。海关数据显示,目前,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249个,前十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中国外贸的朋友圈正变得越来越大。这种“集中度下降、覆盖面提升”的贸易格局,是广大外贸企业在多年的市场开拓中所铸就的。越来越多企业不再把发展的筹码押注在某个单一市场,而是在巩固传统优势市场的同时,把新兴市场变成了贸易新伙伴,由此拥有了更大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外贸活力的真正源头,来自不断生长的经营主体。目前,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78万家外贸主体中,民营企业占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3%,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第一主力。从过去国企占比偏高,到如今民企占比过半,推动外贸主体结构变化的逻辑,已不是短期的政策刺激,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盈利空间。正是这些对市场嗅觉敏

锐的民营企业,源源不断地把中国产业创新能力转化为全球贸易订单,为外贸增长注入了持久内生动力。

站在单月5万亿元的节点上,中国外贸增长逻辑重构的步伐也在加快。过去更多强调的“出口创汇”,正被进出口之间的高效联动所取代,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正不断反哺国内产业升级。这种“进出口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让中国外贸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与全球伙伴的共建共享——既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优质产品,也向世界开放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在扩大开放中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对于外贸未来发展态势,大多数市场人士表示,保持高增长仍有稳固支撑,特别是四季度向来是海外消费旺季,叠加广交会、进博会等重大展会举办,以及电商跨境促销活动密集启动,国内优势产品的出口动能有望持续释放,技术创新的支撑效力还会进一

步凸显,贸易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到技术合作、服务协同等环节。此外,今年以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多项经贸共识,RCEP扩容升级、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等稳步推进,也将持续打造稳定可预期的国际贸易环境。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经贸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重塑等短期内都不可能消失。从市场风雨中历练成长的中国外贸,将会在一次次挑战与突破中变得更加强壮。未来,中国外贸发展绝不会在数字冲高中自我陶醉,增长的可持续性、与贸易伙伴的利益共享,以及如何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将成为中国外贸的新课题。



老年人在家门口有了“医”靠

张建涛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期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明确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这一部署直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护理难题,与《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加强健康管理、上门医疗和家庭病床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要求相契合。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答案之一就蕴藏在社区医养结合能力建设提升中。

老年人看病最怕“折腾”,挂号排队、检查取药,来回奔波,一次常规就医往往耗费半天时间。社区医养结合的核心,就是织密养老与医疗两张服务网,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捷、可及的健康照护。社区可以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慢病随访、健康体检、中医药养生等服务,将医疗照护送到老年人身边,推动服务模式从被动照护向主动健康管理转变。就近、稳定、全面的服务供给,是卫生健康资源持续向基层倾斜的体现,能切实减少老年人就医奔波,让医疗健康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坚持预防为主,是基层健康服务的鲜明导向。作为开展健康风险早期干预的重要阵地,社区通过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筛查、健

康宣教等手段,对老年人的慢性病实施常态化管理,提前干预跌倒、营养不良等健康风险,前移疾病预防关口。老年人健康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就能改善,家庭负担也会减轻,医保基金压力也能随之缓解。基层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是孤立的“单兵作战”,而是融入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系统工程。

深化社区医养结合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比如,基层全科与老年护理人才不足,影响了服务的及时性和覆盖面;医保、长护险政策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衔接尚不充分,很多上门护理项目无法及时报销;不同部门数据壁垒没有完全打通,社区公共服务、养老档案、健康信息难以共享联动;等等。

破解这些难题,应系统施策、精准发力。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薪酬激励、岗位培训机制,定向培养老年护理、康复服务人才,吸引医务人员扎根社区。不断优化医保支付机制,扩大家庭病床、上门护理等项目的医保覆盖范围,用好长护险。实现跨部门协同联动,推动健康评估、养老服务、医疗转诊一体化办理。进一步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将医养站点、适老化改造、助老服务同步纳入社区规划,吸纳社会力量参与,丰富服务供给。

(中国经济网供稿)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文化产业园区规范创新发展,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关系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国际经验来看,文化产业园区是各国发展创意经济的重要抓手,主要依赖市场自发集聚,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比如,英国的“创意产业集群计划”未建一寸新园区,而是通过培育9个研发合作伙伴,让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同铺就知识流动网络,形成一批创意集群。法国马赛的“五月之荒漠地”文化中心由老烟草厂改造,采用“集体利益合作社”运营模式,强调文化艺术与社会行动的交叉,年吸引访客近45万人次,实现了工业片区的系统性文化再生。

在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呈现出“规划引领—梯次培育—市场检验”的产业组织特性。我国的制度优势使政策、资本、土地等要素高效集中,从国家级实验区、示范基地到省市特色园区的梯队培育体系,促使园区分层孵化。大规模市场让新业态快速完成商业化检验,展现出以规划效率抢占产业变革先机的独特优势。

然而,当前一些园区依旧固守“房东经济”,只重视空间的出租,不重视产业的培育。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不高,部分园区定位雷同化降低了集聚效益,创新要素在重复建设中被消耗。另外,数智化水平差距较大,头部园区智能化领先,中小园区

对数据要素的挖掘利用有所欠缺。接下来,应利用真实、多元场景,使创新要素更多向企业集聚,针对性化解问题。

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从“房东经济”转向场景运营,以租金、股权、分红等方式与入驻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将空间、服务、数据等资源变现为开放的场景产品,形成供需透明、收益分成的市场化体系。将场景开放成效纳入运营考核,推动园区发展与企业成长同频共振。

强化创新要素供给。园区定期发布文化新技术应用场景清单,以真实需求吸引资本、人才、数据向企业流动,实现创新要素按需配置。支持园区建设共性技术研发、算力数据共享、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企业获取数据要素的成本,引入高校院所共建产教融合基地,引导多元主体场景落地的项目。

深化“文化+科技”融合。强化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定期发布诸如数智演艺、超高清视听等数字新业态示范场景。鼓励企业投标开发核心技术,以真实场景牵引技术创新,再反哺内容创新,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培育高成长型“文化+科技”企业,让科技变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量。

促进产业链协同。围绕园区主导产业开放供应链场景,组织上下游企业进入实际场景承接任务。促成园区企业、研发机构与服务机构配套协作,形成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联动协同网络,提升产业链整体韧性和竞争力。



换汤不换药



爆款短剧仅拆集改名、更换备案后就跨平台二次上架,暴露出短剧平台粗放扩张、准入门槛过低等问题。此类做法短期内能博取热度,但长此以往将损伤创作者信心、扰乱行业发展生态。应建立版权共治机制,提高侵权成本,鼓励深耕原创精品,推动短剧行业从流量内卷转向精品创作。

探索京津冀品牌协同机制

李志军

定位于复合型、战略型,强调政府主导,更多发挥着辅助、服务于区域治理等作用。

在这方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江苏精品”“上海品牌”“浙江制造”“皖美品牌”等通过交流合作和互认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品牌培育、创建、推广和保护的协同机制,有效促进了长三角品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些深层次挑战同样存在。目前,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同构现象依然有待完善,天津与河北的数字产业协同不足、人力资源配置失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距、数字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北京对周边地区产生的“虹吸效应”也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既与顶层设计协同性不足、利益共享机制不够完善、区域管理思维相对滞后等因素有关,也与区域发展难以从整合资源创建品牌的角度审视思考等原因分不开。

未来如何破题?一方面,京津冀地区可充分借鉴长三角的成功经验,加强顶层设计,将区域品牌建设纳入总体发展规划,并以政策驱动强化品牌形象,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这一区域的品牌

建设有助于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减少重复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通过高协同性的京津冀品牌建设,可以树立区域对外具有高质量、高信誉的代表性形象,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这一区域的品牌

建设有助于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减少重复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通过高协同性的京津冀品牌建设,可以树立区域对外具有高质量、高信誉的代表性形象,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这一区域的品牌

建设有助于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减少重复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通过高协同性的京津冀品牌建设,可以树立区域对外具有高质量、高信誉的代表性形象,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这一区域的品牌

在近日举办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统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基础制度规则,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税收、考核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重点是打出“一个条例、三张清单、三项制度”的“组合拳”。“三项制度”指的就是有利于市场统一的统计、税收、考核制度。其中,财税制度是调节央地、区域间利益关系的基础制度,也是带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不合理行为的深层原因。

从现实情况看,财税制度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仍较突出。一方面,总部经济带来的税收与税源背离现象仍大量存在,企业生产基地、分支机构所在地承担了土地、能源、劳动力、环境承载力等大量成本,贡献了实质税源,但税收收益更多集中于总部注册地,造成税源贡献地与税收收益地错配。这种利益格局,容易导致各地争抢企业总部落地,诱发区域间招商内卷,人为扭曲产业链空间布局。

另一方面,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财税收益分配机制还不健全,产业转出地不愿放弃既有税基,承接地难以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财税回报,由此引发设置隐性壁垒的不当行为,限制企业跨区域迁移、项目跨区域布局。在这些因素驱动下,违规财政返还、先征后返等行为屡禁不止,既破坏公平竞争秩序,也固化了市场分割格局。

基于此,可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打通市场堵点、破除利益藩篱的治本之策,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加快构建适配统一大市场的现代财税制度,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利益动机。

健全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体系,促进权责匹配。适当加强中央在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性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由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确需委托地方实施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足额保障资金,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以此降低地方因事权过重、财力不足而产生的保护主义冲动。健全地方税体系,持续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拓展地方稳定可持续税源,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保障能力,引导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优化本地营商环境、消费环境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严格规范财税政策执行,维护全国财税制度统一性与公平竞争秩序。全面落实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严禁各地自行出台偏离统一规则的差异化财税优惠政策。建立常态化清理规范机制,对区域性税收返还、财政奖补、变相减免等政策动态排查、分类处置,坚决纠治先征后返、财政列支返还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消除区域间政策洼地。持续规范涉企收费管理,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不得新设涉企收费项目,推进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全国统一,实现跨区域执法尺度一致,保障经营主体在不同区域享有同等待遇、同等执法标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完善跨区域财税利益共享机制,破解税收与税源错配难题。针对跨区域经营企业、总部经济、产业转移等场景,加快建立税收与税源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保障税源地获得相应收益。总结复制推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先行地区实践经验,在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建立按税源贡献、要素投入、就业带动等指标核算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税收收益合理分配、发展成果共同分享。完善跨区域财税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区域间政策协同、税收征管协同、数据共享协同,消除区域间政策壁垒和征管差异,探索建立跨区域财税争议协调与利益补偿渠道,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财税治理格局。

也要认识到,三项制度彼此关联。在通过调整财税制度理顺利益的基础上,还需协同优化统计、考核制度,筑牢数据基础、校准发展方向,三者一体推进,从行为动机层面铲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的土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走深走实。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财税室主任、研究员)

在近日举办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统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基础制度规则,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税收、考核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重点是打出“一个条例、三张清单、三项制度”的“组合拳”。“三项制度”指的就是有利于市场统一的统计、税收、考核制度。其中,财税制度是调节央地、区域间利益关系的基础制度,也是带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不合理行为的深层原因。

从现实情况看,财税制度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仍较突出。一方面,总部经济带来的税收与税源背离现象仍大量存在,企业生产基地、分支机构所在地承担了土地、能源、劳动力、环境承载力等大量成本,贡献了实质税源,但税收收益更多集中于总部注册地,造成税源贡献地与税收收益地错配。这种利益格局,容易导致各地争抢企业总部落地,诱发区域间招商内卷,人为扭曲产业链空间布局。

另一方面,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财税收益分配机制还不健全,产业转出地不愿放弃既有税基,承接地难以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财税回报,由此引发设置隐性壁垒的不当行为,限制企业跨区域迁移、项目跨区域布局。在这些因素驱动下,违规财政返还、先征后返等行为屡禁不止,既破坏公平竞争秩序,也固化了市场分割格局。

基于此,可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打通市场堵点、破除利益藩篱的治本之策,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加快构建适配统一大市场的现代财税制度,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利益动机。

健全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体系,促进权责匹配。适当加强中央在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性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由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确需委托地方实施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足额保障资金,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以此降低地方因事权过重、财力不足而产生的保护主义冲动。健全地方税体系,持续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拓展地方稳定可持续税源,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保障能力,引导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优化本地营商环境、消费环境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严格规范财税政策执行,维护全国财税制度统一性与公平竞争秩序。全面落实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严禁各地自行出台偏离统一规则的差异化财税优惠政策。建立常态化清理规范机制,对区域性税收返还、财政奖补、变相减免等政策动态排查、分类处置,坚决纠治先征后返、财政列支返还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消除区域间政策洼地。持续规范涉企收费管理,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不得新设涉企收费项目,推进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全国统一,实现跨区域执法尺度一致,保障经营主体在不同区域享有同等待遇、同等执法标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完善跨区域财税利益共享机制,破解税收与税源错配难题。针对跨区域经营企业、总部经济、产业转移等场景,加快建立税收与税源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保障税源地获得相应收益。总结复制推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先行地区实践经验,在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建立按税源贡献、要素投入、就业带动等指标核算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税收收益合理分配、发展成果共同分享。完善跨区域财税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区域间政策协同、税收征管协同、数据共享协同,消除区域间政策壁垒和征管差异,探索建立跨区域财税争议协调与利益补偿渠道,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财税治理格局。

也要认识到,三项制度彼此关联。在通过调整财税制度理顺利益的基础上,还需协同优化统计、考核制度,筑牢数据基础、校准发展方向,三者一体推进,从行为动机层面铲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的土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走深走实。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财税室主任、研究员)